

元初南方知識份子

——詩中所反映出的片面

勞 延 煊

徒把金戈挽落暉，南冠無奈北風吹。子房本爲韓仇出，諸葛安知漢祚移？
雲暗鼎湖龍去遠，月明華表鶴歸遲。何須更上新亭飲？大不如前灑淚時。

——虞集《輓文文山丞相》¹

「四傑」之一的虞集是虞允文的五世孫，² 元泰定帝及文宗時曾被重用。在這首膾炙人口的詩裏，他不但對文天祥深致追悼惋惜之意，更用「新亭」典故表示那時的江南已不能與東晉時的江南相比。這樣的詩如果出現於滿清時代，很可能導致文字獄，然而在元代卻未激起任何波瀾來。從若干宋末元初人所寫的詩文集裏，我們可以看到當時南方的士人往往用詩來寄託他們的情感，而這種情感並不只局限於黍離麥秀之思。就那些作者的立場來看，詩自然是最合適的體裁，言簡意賅，既能達到發洩的目的，同時流傳不廣，不致引起很多人注意。惟其如此，往往就不易看出原作者的真正著意所在。本文擬將這一類的詩選出若干首，略加分析，藉以觀測某些南宋遺民入元之後的心境。

宋亡以後，感觸最深的大概莫過於隨着德祐帝、謝后、全后等北上的那些官吏及士人了。由於這個緣故，被遣隨行的太學生徐應鑣在未啓行以前即與子女三人自焚，經僮僕救出，然後又投井而死。³ 在赴燕途中，尚有類似的情形。黃潛在一篇墓誌銘中說：

德祐內附，士大夫居班行者例遣北上。司農府君〔龔灤〕以列卿例在遣中。行至某縣，不食而死。⁴

¹ 見虞集《道園遺稿》（《四庫全書珍本》五集本）卷三，頁三上——下。陶宗儀《輓耕錄》（世界書局本）卷四，頁七十二。

² 趙汭《東山存稿》（《珍本》二集本）卷六，頁一上——三下。《元史》（《百衲本》）卷一八一，頁四上。

³ 徐應鑣事跡除《宋史》本傳外，可參看何夢桂《潛齋文集》（《珍本》五集本）卷二，頁三十一上，《挽太學正節先生徐應鑣》，同書卷五，頁十九上——二十上，《太學正節先生徐公序》；方回《桐江續集》（《珍本》初集本）卷十二，頁十七上——下，《故太學徐君應鑣哀辭并序》。

⁴ 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四部叢刊》本）卷三十三，頁一上。

可惜除了極少數的例外，描述他們經歷和觀感的詩文留存至今者已不可多觀。其中首尾俱備而又能作到「怨而不怒，憐而不激」的自當推「以善琴受知紹陵」的汪元量所著《湖山類稿》及《水雲集》。然而二者均已單行，⁵且又為人所熟知，因此不擬在此加以申論。

根據周密《癸辛雜識》：「丙子〔一二七六〕春，三學歸附士子入燕者共九十六人。至元十五年〔一二七八〕所存者止一十八人，各與路學教授。」⁶他列舉的十八人中，只有林桂發和張觀光二人見於其他記載，⁷別的人尙待另加考察。關於張觀光，茲先徵引吳師道的《張屏岩文集序》中所包括的履歷部分：

當宋季年，以詩義為瀨士第一。入太學，才二十有六歲。英華之氣，發於文辭。同時輩流固望而敬之矣。未幾國亡，隨其君北還。道途之淒涼、羈旅之鬱悒，閱時悼己、悲歌長吟，又有不能自己者焉。方中朝例授諸生官，獨以親老丐歸。遂得藝學教授。改調時，年甫強仕，即陳情辭祿，以遂終養。杜門深居，沉潛經籍。縷析羣言，益造精微，不為苟作。⁸

現存張觀光所撰《屏巖小稿》僅一卷，由《四庫全書》採入。⁹然而《四庫提要》編者說「其始末未詳」則屬失考。¹⁰綜覽現存一卷本，可以看出它已經不是足本。因為吳師道序中所說「道途淒涼」等等的描述並不見於書中，所剩下的似乎都是他晚年的著作，形之於詩的感情也已經不是十分激烈。雖然如此，我們可以發覺他心中有種種不同的悵鬱。其中之一，自然是國亡以後所感到的悲哀，例如下列的兩首詩：

《晚春即事》

園林芳草歇，風雨暗荒城。轉眼青春過，臨頭白髮生。啼鶉亡國恨，歸鶴故鄉情。三徑多芳草，東還許未成。¹¹

⁵ 俱收入丁丙所編的《武林往哲遺著》。

⁶ 《癸辛雜識》（《學津討原》本）續集下，頁九。《元史》卷九，頁十三上：「至元十三年九月庚子，命姚樞、王磐選宋三學生之有實學者留京師，餘聽還家。」應是此事的前奏。

⁷ 林桂發小傳見《至順鎮江志》卷十八，頁八下。

⁸ 吳師道《吳正傳先生文集》（中央圖書館影印本），頁四〇一——四〇二。

⁹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藝文影印本）卷一百六十六，頁二十九下——三十上。《四庫全書珍本》三集，第二七六冊，此書亦由胡宗楙編入《續金華叢書》。《屏巖小稿》中所錄諸詩與黃庚《月屋漫稿》中若干詩頗多重出，《提要》編者已經指出。

¹⁰ 不僅前引吳師道序中包括了他的事蹟，《東陽縣志》裏有更詳細的小傳，引見《宋元學案補遺》（世界書局影印本）卷八十二，頁一百四十下——一百四十一上。

¹¹ 張觀光《屏巖小稿》，頁十四下——十五上。

《西湖行春》

畫船無復沸笙歌，湖水年年自碧波。回首蘇公堤上柳，綠陰不是舊時多。¹²

第一首很可能是他尚未被遣回浙江任婺州教授以前作的，否則最後三句的意思便沒有着落。第二首顯然是在興「今不如昔」之嘆。集中像這樣的詩還多，茲不具引。

吳師道說張氏早年以文辭負盛名，顯然他自己也一直以此自負，至老不衰。但終因客觀環境而懷才不遇，事與願違。他自負的程度，從以下諸詩可見：

《和茅亦山韻》

一生場屋夢，老去付悠悠。始信功名事，難將智力謀。有才如孔孟，無命不伊周。吾道今如此，蒼天可問不？¹³

《偶成簡任肅齋教諭》

百歲光陰一轉蓬，晚年不與少年同。事因錯處人方省，詩到窮時句始工。獻賦未逢楊得意，憐才難遇杜司空。有時追憶承平事，猶道繁華是夢中。¹⁴

在此他以司馬相如、李白自況之餘，又提出孔、孟雖有才也不能達到像伊尹、周公一樣佐輔目的的例子來安慰自己。這樣的情懷在傳統中國時期的知識份子中並非沒有。但是張觀光等一班人卻把耽誤功名的責任推到因宋朝滅亡而科舉停止一事上，這是與其他時代不同的。

在集子中最能洩露張氏心理的是題為《漫述》的十首絕句，先錄之於下。

百拙懶營生計事，一貧方識丈夫心。簞瓢陋巷皆真樂，
 何用多藏鄙鳩金？
 青春易過不多日，白晝得閒能幾人？有限光陰空役役，
 堆錢難買百年身。
 對客莫談當世事，閉門且讀舊時書。蓬萊獻賦心猶在，
 只恐無人荐《子虛》。
 楚江何忍沈清客，周粟安能活餓夫。慨想前修千古事，
 孤忠高義後來無。
 逢人休要說公卿，老去無心慕寵榮。李不封侯劉不第，
 千年青史亦傳名。

¹² 同書頁七十上。

¹³ 同書頁廿四下。

¹⁴ 同書頁四十八下。這裏杜司空是說「杜工部」，指他久不見李白的那首詩中「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的句子。

世事艱難如意少，功名榮耀誤人多。浮雲富貴非吾願，
且買扁舟理釣簑。
脫巾漉酒心先醉，著屐登山腳便輕。浩飲清遊憶陶謝，
古人千載尚留名。
眼前萬世等一夢，世上幾人能百年？千古英雄今已矣，
北邙荒塚草芊芊。
文盟無主江湖冷，詩社欠人風月閒。老去盍爲歸隱計，
卻於何處買青山。
烘柳日高花院暖，炷沈煙冷竹牕虛。閒編怕見傷懷事，
不讀《離騷》讀《四書》¹⁵

如果匆匆將這十首詩閱讀一過，我們只會覺得張氏可能因爲在「廣文官冷」任上感到前途茫茫，一邊發牢騷，一邊安慰自己。事實上，這些詩清晰地反映出他患得患失，極端矛盾的心理。首先，他指出簞食瓢飲的顏回確實比守鄴塢積稻「足以畢老」的董卓要快樂，但又發愁如何去求田問舍，然後才能歸隱。其次，他重覆孔子「富且貴於我如浮雲」的話，另一方面，卻擔心沒有第二個楊得意向元朝皇帝來推荐與司馬長卿才氣相當的他——雖然他自己像杜甫一樣，有心向元帝獻賦以求進身。第三，他明明說「功名榮耀誤人多」，又因不願見到感傷的語句而「不讀《離騷》讀《四書》」。《四書》是甚麼？難道不是一篇篇修齊治平的道理，一章章干祿的典範嗎？如果只是爲了使心情平靜，爲甚麼不去讀老釋二氏的著作？¹⁶ 第四，使人感到驚訝的是：既然屈原、夷齊的孤高忠義如此使他欽佩，李廣、劉蕡的特立獨行和陶淵明、謝靈運的灑脫（其實陶遠在謝之上）如此令他傾倒，而且對當世事如此不滿，那麼爲甚麼還有獻賦之意，而且孜孜不倦地去讀《四書》以備進用呢？第五，詩中提到讀《離騷》的問題頗可注意。全集之中，說到讀其他書籍和詩文之處不是沒有，但頻率遠在《楚辭》、《離騷》之下。例如他在七十生辰的詩中說：

門無賀客清如水，獨對蘭花課《楚辭》。¹⁷

固然，《楚辭》是中國文學裏的精英，但三百篇、陶詩、李、杜、蘇、黃等等何嘗不

¹⁵ 同書頁六十一上——六十二下。

¹⁶ 有人也許會不同意這一點，因爲寫詩有時限於用韻，可以影響到詩人原意的表達。此處「四書」二字可能只不過是爲了叶韻而已。但如僅是爲叶韻，魚韻中其他字儘多，何必非用「書」字。即使用「書」，也尙有其他語辭——例如「子書」。況且自朱子《集註》以後，《四書》自有其特殊意義，張觀光應是不會隨便用來湊數的。

¹⁷ 《屏巖小稿》頁三十一下。

是？何以張氏偏愛《楚辭》到如此的程度，而他的詩並不顯示受到很深的《楚辭》影響？細察其故，當係由於張氏覺得他與屈原的處境有些相似的地方。根據《史記·楚世家》與《屈原列傳》，¹⁸ 我們知道屈原的時代正當楚的強隣秦國壓境，楚懷王主張與秦友善，遭屈原反對。但他仍聽了幼子子蘭的話去訪問秦國，最後被秦國扣下，客死於是。屈原在這時作《離騷》，「一篇之中，三致志焉」，仍然不能夠扭轉後來頃襄王繼續施行對秦友好的策略。楚和秦的關係，雖與後來南宋與蒙古的關係不是全同而是類似，屈原對當時楚國軟弱外交政策的憤恨卻和南宋知識份子對當時時奸臣誤國的深惡痛絕可以相提並論。楚懷王入秦與德祐帝赴燕的前提不同，兩人最後都不免客死異域。懷王尚得歸葬，德祐實是成了「黃金臺下客，應是不歸來」。¹⁹ 同時，用秦滅楚來影射蒙古滅宋也不能說全不恰當。有這種瞭解之後，讓我們看一下張氏提到《離騷》的其他幾首詩。

《言懷》

萬卷詩書千古事，一燈牕火十年心。功名夢斷身無用，閒補《離騷》學楚吟。²⁰

《寒夜即事》

倚徧闌干更漏長，柔髭撚斷為詩忙。清分梅影夜宜月，寒入雁聲天正霜。懷古頓添孤客恨，追權難學少年狂。讀書牕下篝燈坐，一卷《離騷》一篆香。²¹

《端午月山主人酒邊即事》

牕外葵榴照眼明，香蒲沁酒注銀瓶。自無量飲堪同醉，非慕清名傲獨醒。一日沈湘悲楚客，千年弔古讀《騷》經。他鄉記節聊隨俗，艾虎殊符挂戶庭。時序催人易白頭，端陽懷古客添愁。殊符不寫湘纍恨，角黍難包楚國羞。記節何妨斟蟻酒，奪標無復見龍舟。高歌思遠樓前路，掩雨珠簾今在不？²²

綜合這四首詩的旨意，我們可以說張氏晚年深深認識到十年窗下用在學習儒家經典的工夫完全白費。功名既然得不到，乃藉讀《離騷》來消磨時日。在讀的時候，難免會想到屈原和當時楚國人的遭遇，從而回過頭來追憶自己所親身經歷的南宋的覆亡。他對屈原的認同，並不止於「眾人皆醉我獨醒」而已。詩中「湘纍恨」、「楚國羞」與其說是咏楚，毋寧說是哀宋。同時，「一日湘沈悲楚客」，也就是「閒坐悲君亦自悲」的意思。

¹⁸ 《史記》（開明本）卷四十，頁一四四，卷八十四，頁二〇九——二一〇。

¹⁹ 《汪水雲集》（《武林往哲遺著》本）《附錄》上，頁一上，《恭宗皇帝送汪大有南還詩》。此詩自然不見得就是德祐帝所作。

²⁰ 《屏巖小稿》頁五十九。

²¹ 同書頁四十三。

²² 同書頁五十上——五十下。

惟其如此，讀《離騷》時才引起他的共鳴，愁與恨便由懷念屈原而激發出來。這種情感積憤到了相當的地步，竟會使他不忍卒讀「帝高陽之苗裔兮」以下的句子，而逼着自己去重看「物有本末，事有終始」一類的話。如此的境遇，也就可憫了。

如果上面以元比秦的假設不是完全沒有根據，那麼集中一首《讀秦紀》的詩也應稍加分析：

并吞六國獨稱雄，經籍灰飛烈焰中。書外有書焚不盡，一編杞上漢成功。²³

可以指出的是，傳說曾經收葬宋高宗、孝宗二陵骨骸的林景熙²⁴所著《霽山文集》裏，也有一首題目全同的詩：

琅邪台上晚雲平，處視眈眈隘八紘……書外有書焚不盡，一編圯上漢功名。²⁵

二詩的意思都是說，秦始皇征服天下後雖然不可一世，然而革命的種子是難以全部消滅的。最後終於由得到黃石公書的張良輔佐劉邦，滅秦建漢。詩的最後兩句用字用典幾乎全同，似乎不是沒有因襲的可能。²⁶但我們的興趣並不在此。這裏的中心問題是：既然他以秦喻元，以楚擬宋，那麼「一編圯上漢成功」是不是隱隱約約的在希冀元朝的速亡呢？這是極為可能的。但是「讀秦紀」終究是歷代文人用濫了的題目。因此，對於這個推測，無法加以百分之百的肯定。

現在讓我們把從詩中所見到張觀光的個性作一個簡短的描述。無疑地，他文才很高。二十幾歲入太學時已經出人頭地，很被同輩看重，按理可以有所作為。然而宋亡以後，只得到一個儒學教授的閒差。在這種情形之下，有的時候便覺得北山東籬的隱逸生活能使他閒適地渡完餘生，有時雖然明知「功名榮耀誤人多」，卻仍想學杜甫獻《三大禮賦》的故事，去向元廷尋取功名。這種心理已經是非常錯綜複雜的了。尤其使他耿耿於懷的，則是他親身經歷到的亡國之恨，這一點可以分兩個層次來說。第一層，他提到義不食周粟的事，而慚愧自己無法作到，但這還僅僅是一個改朝換代的問題。第二層，他用讀《離騷》來暗示，除了改朝換代以外，他心目中還存在着一個民族問題：元之異於宋

²³ 同書頁八十七下。

²⁴ 參看鄭元祐《遂昌山人雜錄》（《讀畫齋叢書》本）頁九下——十上。陶宗儀《輟耕錄》（世界書局本），卷四，頁六十六。至於收陵骨的事，雖有林景熙、唐珣等的詩可作參考，但詩的內容過於晦澀，歷來即多聚訟紛紜。元代初年的趙沔已說過：「余後遊錢塘，問於父老，乃無人能言其事。」（見《四庫珍本》二集所收《東山存稿》卷五頁二十八下——二十九下，《跋謝翱冬青樹引後》。）元末明初的陶宗儀在《輟耕錄》裏也不能作肯定的結論。因此，在本篇中不擬討論這些和收陵骨有關的詩。

²⁵ 《霽山文集》（《珍本》五集本）卷二，頁六。

²⁶ 除了這一首以外，《屏巖》、《霽山》二集中還有好幾首重出的詩。到底是誰的詩屬入另一人的集中，一時恐無法論定。

不但像秦之異於楚，而且更有過之。必須指出，他所顯示出的民族思想，是一種廣義的認識，不是狹義的「夷夏之辨，胡漢之別」。否則，如果覺得元廷還是像《蒙韃備錄》或者《黑韃事略》中所敘述的那樣原始朴直，應該不會想到讀《四書》以干祿，藉獻賦以求功名的可能性。（我們應當記住，他被遣回南方作婺州路教授以前曾停留在燕京約有兩年左右，對於當時的政治氣氛和文化程度一定有足夠的瞭解。）

事實上，這種心理上的重重矛盾是當時南方士人所共有的，茲再引一兩首詩以見張氏實屬常例而非例外：江西樂安縣的何中是一代大儒吳澄的表弟，他的父親何天聲與伯父何時都曾在文天祥幕中服務，²⁷《宋史翼》並提到他伯父因為不肯降而全家被殺。²⁸出身於這樣的家庭，他當然不會沒有銅駝荆棘之哀。他寫道：

商山非遠避，胡爲可避世？人間已蒂秦，紫芝尙周味。²⁹

這豈不是在說，客觀環境還沒有隨宋社已屋而改變，所以希冀有一天能學四皓，爲代元而起的新朝効力？他讀晉史時，由於晉和趙宋有同樣的悲哀，除了「感激繫衷腸」以外，又有這樣的論調：

填石□□□□（原闕），膠杯誰能舟？我豈不知我？量力乃哲謀。有才比管葛，感奮爲武侯。保身慕夷齊，靜退淵明儔。物亦非所忌，名亦非所求。北窓羲皇上，東籬晉宋秋。零陵一杯酒，終古屬斯愁。³⁰

全詩的含義可以用「明哲保身」四字來概括。這樣的情緒，在題爲《正月五日吾族諸老儒服縱遊》的詩裏也有類似的發洩：

山中忘世換，人事又從新。儒服吾宗老，南冠故國人。悲風千載淚，幽谷一年春。折取山花供，清香已滿巾。
有計能興漢，無才可美新。才名歸後輩，事業見前人。野水孤村暮，梅花萬里春。斜川同日月，漉酒正須巾。³¹

詩的含義很清楚：住在鄉下，朝代同歲月的轉移就像「暗中人事忽推遷」一樣，是不易感覺到的。他的家雖是世族，在新建立的朝代統治之下也不過是「楚囚」而已。他並不

²⁷ 見於揭傒斯《揭文安公全集》（《四部叢刊》本）卷十三，頁十四上——十六上，《何先生墓誌銘》。他父親的墓誌銘見於程鉅夫《程雪樓文集》（中央圖書館影印本）卷十六，頁十三下——十四下。

²⁸ 陸心源輯《宋史翼》（《潛園叢書》本），卷三十六，頁八下。

²⁹ 《知非堂稿》（《珍本》五集本），卷一，頁十四下。

³⁰ 同書卷一，頁九下。

³¹ 同書卷三，頁一下——二上。

打算劇秦美新而寧願學子房興漢，但時勢並不允許。這時只能回想他父親伯父（和其他「諸老」）的作為，並且盼望後輩能有所成就。至於自己呢，只有學陶淵明去尋求濁酒中的深味去了。

以上幾首詩很可能反映何中在元代統治江南較早時期的感觸。我們從集中一些別的作品可以看到他對元政府的態度顯然不一致，這種不一致是前後的而非同時的。在《送程學士》（即是程鉅夫）中，有這樣與前引詩中思想矛盾的句子：

……皇元經制宰九有，曾侍先皇討論久。登庸耆俊徵舊聞，宗社靈長自天祐。中書堂中庶務清，四方萬姓歌升平。應無闕事可商略，定見房杜藏功能。……³²

其中既然提到「先皇」，應該是成宗時代作的。成宗可以說是一個平庸的皇帝，如何能把「聖朝無闕事」的話用在他身上，並且比擬程鉅夫的職務為房、杜的協理貞觀之治呢？如果退一步說，這只是爲了要捧程鉅夫，而其主旨不是在讚頌元朝，那麼且看下面一首題爲《元日》的詩：

聖主龍飛肇紀元，野人相賀板扉前。不知顏色老昨日，共詫時光勝舊年。井口杏花春食雨，墻筐柳蕊暖肥煙。長溝緩繞風猗綠，林下烏犍漸受鞭。³³

以即位的時間來推測，「聖主」可能是指泰定帝而言。此時田間一派太平景象，包括作者自己在內的鄉民難免要彼此互相慶賀。但在這種「共詫時光勝舊年」的升平氣氛中，宋朝亡國的悲劇大約在他腦中已經沒有太深的印象了。如果稍稍把他自己的話次序調換一下，他這時已經多少成了「有辭美新、無計興漢」的狀態。事實上，根據揭傒斯爲他所作的墓誌銘，³⁴他在至大初（大約在一三一〇年以前）即到燕京者見程鉅夫、元明善、姚燧等名家，「以文章自通。會諸權臣用事，內外翕翕。居兩月，天大雪，竟不別而去。」於此也可以反映出他並不完全是一個自甘寂寞，「物亦非所忌，名亦非所求」的人。他賀表兄吳澄八十的壽詩更可以顯示這種態度：

四朝加禮聘車勤，又際龍飛沐異恩。聖主執經常賜坐，大官承學盡趨門。格天勳業身徐退，平地神仙道愈尊。春有八千纔八十，桃花紅嫩酒盈尊。³⁵

其中所謂「四朝」是成宗、武宗、英宗和泰定帝（見以下討論吳澄部分）。據危素所撰年譜，³⁶吳澄八十歲時當天曆二年（一三二九）。他的八十歲生日和周王（明宗）即位都

³² 同書卷四，頁十四下——十五上。

³³ 同書卷五，頁十六上。

³⁴ 《揭文安公全集》，卷十三，頁十五上。

³⁵ 《知非堂稿》卷五，頁十九上。

³⁶ 吳澄《吳文正集》（《珍本》二集本）《附錄》，頁二十二上。

是在那一年的正月，但是這裏所說的龍飛卻是指頭一年文宗的即位。³⁷「聖主執經常賜坐」自然是說他泰定元年在經筵進講的事，³⁸「大官承學盡趨門」不用說是包括董士選、元明善、盧摯等一班當時在江南任事的北方籍的名公巨卿了。³⁹評者謂何中的詩集是「名章雋句，一一具存，」⁴⁰「佳句疊見」⁴¹，這是不錯的。然而此處「沐異恩」、「聖主」、「大官」等辭則充分點明他到晚年⁴²仍不能忘情於功名。所以他對於吳澄的欽羨，也才會這樣表露無遺。這與前引詩中的「帝秦」、「避世」是多麼鮮明的一個對比。《元史》把他列入《隱逸傳》，主要是由於他未得顯宦之故。⁴³

何中的表兄吳澄是當時理學家的巨擘，也是元廷不斷爭取入朝的對象。⁴⁴他對於在大都的統治階級，似乎有點若即若離的態度。在《元史》中，他與劉因合傳，自不是偶然的。他的詩是有助於這種態度的瞭解的極為難得的材料。現在為了便於討論起見，先把他四次赴燕的經過列一簡表如下：

(一) 至元二十四年(一二八七)：春適燕，十二月還家。

(二) 大德六年(一三〇二)十月丁亥至京師，七年(一三〇三)春治歸，五月己酉至揚州。

(三) 至大二年(一三〇九)五月至京，皇慶元年(一三一二)正月移疾去職，三月至真州。

(四) 至治三年(一三二三)五月至京師，泰定二年(一三二五)八月辛亥移疾，十二月還家。⁴⁵

關於第一次訪燕，所有資料都說是出於程鉅夫的慫恿。例如虞集的行狀在敘述這次的原

³⁷ 《元史》卷三十一，頁四上：「正月……丙戌〔二十八日〕帝〔明宗〕即位於和寧之北。」而據年譜，吳澄的生日是正月二十日，前後次序不合，所以此處不應指明宗即位。

³⁸ 《吳文正集·附錄》，頁十九上；《元史》卷二十九，頁九。非常有趣的一點，是詩中「龍飛」的皇帝文宗在即位詔中（見《國朝文類》卷九，頁十五下，亦見《元史》卷三十二，頁八上——九下）公開攻擊「執經賜坐」的「聖主」泰定帝，說他與「賊臣帖夫、也先帖木兒等，潛通陰謀，冒干寶位。」然則孰為飛龍，孰為聖主乎？

³⁹ 參看虞集所撰行狀，《道園學古錄》（《四部叢刊》本）卷四十四，頁六。《元史》卷一百七十一，頁五下。

⁴⁰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六十七，頁十二上。

⁴¹ 引見《元詩紀事》（鼎文書局影印本）卷十二，頁二一二。

⁴² 根據揭傒斯所作墓誌銘計算（見註三十四），他在作此詩以後四年（至順三年，一三三二）去世。

⁴³ 《元史》卷一百九十九，頁七下——八上。

⁴⁴ 生平具見於《道園學古錄》卷四十四，頁二下——十四下，《故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臨川先生吳公行狀》；揭傒斯所撰神道碑（《吳文正集·附錄》，頁五十上——五十六下）；危素所撰年譜（同書《附錄》，頁一上——二十三下）；以及《元史》本傳（卷一百七十一，頁五上——九上）。

⁴⁵ 日期與紀事均本諸危素所編之年譜。

委時便說：

〔至元〕二十三年〔一二八六〕，程文憲公奉詔起遺逸於江南。⁴⁶至撫州，強起先生。以母老辭。程公曰：「不欲仕可也。燕冀中原，可無一觀乎？」母夫人許其行，與程公同如京師。既至，程公猶荐先生，不令其知。先生覺其意，力以母老辭。二十四年〔一二八七〕歸。朝廷老成及宋之遺士在者，皆感激賦詩餞之。故宋宗室趙文敏公孟頫，方召為兵部郎官，獨書朱子與劉屏山所和詩三章以遺之。一時風致，識者嘆之。⁴⁷

虞集在行狀中只說吳澄第一次訪燕時拒絕程鉅夫的推薦，以母親年高為藉口（其實他的母親要到十一年以後才去世）。⁴⁸趙孟頫在《送吳幼清南還序》中就給了我們更深一層的理由：

士少而學之於家，蓋亦欲出而用之於國。使聖賢之澤，沛然及於天下。此學者之初心。然而往往淹留偃蹇，甘心草萊岩穴之間，老死而不悔，豈不畏天命而悲人窮哉？誠退而省吾之所學，於時為有用耶，為無用耶？可行耶，不可行耶？則吾出處之計，瞭然定於胸中矣。非苟為是栖栖也。近年以來，天子遣使者巡行江左，搜求賢才，與圖治功。而侍御史程公亦在行。程公思解天子渴賢之心，得臨川吳君澄與偕來。吳君博學多識，經明而行修，達時而知務，誠稱所舉矣。而余亦濫在舉中。既至京師，吳君翻然有歸志。曰：「吾之學無用也，迂而不可行也。」賦淵明之詩一章，朱子之詩二章而歸。吳君之心，余之心也。以余之不才，去吳君何啻百倍。吳君且往，則余當何如也。……吳君行有日，謂余曰：「吾將歸遊江澗，求子之友。」吾既書所賦詩三章以贈行，又列吾師友之姓名，使與君因相見而道吾情。……⁴⁹

趙孟頫寫給吳澄的詩三章是甚麼已不能確定。但其中說「淵明之詩一章」，不論是那一首，用意自是不言可喻。至於「朱子之詩二章」，《行狀》中作《朱子與劉屏山所和詩三章》（見前），《年譜》亦云：「趙文敏公孟頫……獨書朱子與其師劉先生屏山所賡三詩為贈。」⁵⁰數目自然應當以趙氏本人的話為準。翻閱朱熹文集，我們認為似乎是指

⁴⁶ 關於元初江南訪賢的問題，參看姚從吾師的《程鉅夫與忽必烈平宋以後的南人問題》（台灣大學《文史哲學報》第十七期，頁三五四——三七九）及孫克寬教授《江南訪賢與延祐儒治》（《元代漢文化活動》，台北中筆書局，民國57年，頁三四五——三六三）。

⁴⁷ 《道園學古錄》卷四十四，頁五下。

⁴⁸ 見《年譜》，《吳文正集·附錄》，頁十一下。

⁴⁹ 趙孟頫《松雪齋集》（《四部叢刊》本）卷六，頁九下——十上。

⁵⁰ 《吳文正集·附錄》，頁九下。

以下的詩。

《次韻判院丈⁵¹雪意之作》

端居歲復窮，閉戶守冲澹。風陰原野悲，月黑庭除暗。淅瀝靜先知，崩奔誰與探？坐想青瑤林，寒光生素艷。

《熹伏蒙判院丈垂示，用韻喜晴之句，率爾奉酬，伏乞笑覽》

客枕終難穩，歸來鼾息深。曉雞回遠夢，缺月掛空林。冰谷晨加帽，晴窗晝解襟。詩筒多妙語，仍喜舊盟尋。⁵²

第一首主題在咏雪，但可以看出含義恰是「欲濟無舟楫、端居耽聖明」的反面。第二首當然還是「三逕就荒，松菊猶存」的意思。特別是頭兩句與最後一句和吳澄當時「歸來來兮」的心緒非常契合。當然，最能代表吳澄心理的並不是這些，而是下面所要討論的，他本人的詩。

首先，在《吳文正集》裏，有二十五首《感興詩》，提綱挈領的說明他對於學術與政治（包括時政）的看法。⁵³ 其中說理的詩，不在本篇討論範圍之內，⁵⁴ 毋須徵引。其他有關的，主要是以下十首：

《至元丁亥（一二八七）自京師回，舟中寄子昂及在朝諸公》

一⁵⁵

洪流啓三聖，烈炤顯六籍。世間土木⁵⁶偶，不度水火厄。

二

長氏⁵⁷《原道》篇，董生正誼語。唐宋千年間，微子吾誰與？

三

周召分方伯，鄗留著世家。西山二子薇，東陵故侯瓜。

⁵¹ 劉子翬（屏山）曾通判興化軍事，見朱熹《朱文公文集》（《四部叢刊》本）卷九十，頁二上。

⁵² 《朱文公文集》卷二，頁十五下——十六上。

⁵³ 《吳文正集》卷九十一，頁一上——四下。詩的數目共二十五，似乎是故意要與《楚辭》的數目暗合。

⁵⁴ 例如第一首「圓氣直似專，方形翕還闕。眇眇血肉身，中立名三極。」是說天圓地方，天虛而地有成形。人在二者之間，兼有天地之道。《易繫辭》：「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三極也就是三才。（《四部叢刊》本《周易》卷七，頁二上）。

⁵⁵ 這裏的號碼是為討論的方便加上去的，與這些詩原來的序列並無關係。

⁵⁶ 「木」在《四庫》文淵閣本中作「水」，顯然是筆誤，今改正。

⁵⁷ 「長氏」二字原文如此，毫無意義。疑當作「退之」二字，以形近而致誤。劉勰當然也有《原道》篇，但在此更不可解。

四

子房爲韓心，孔明興漢事。三代以後人，卓偉表萬世。

五

揚雄莽大夫，陶潛晉處士。男兒百歲中，蓋棺事乃已。

六

漢皇棄梁傅，鄭公負唐帝。君臣際會難，禮樂竟淪廢。

七

箕疇八政目，末師首食貨。井田封建後，此事如何可？

八

踰濟巢鷓鴣，入洛啼杜鵑。大事可知已，禽鳥得氣先。

九

元后宅土中，神皇主天下。書傳三千年，未有如此者。

十

風前白浪惡，雨後黃流渾。公無渡河去，天未喪斯文。

以上所引的十首詩，並沒有以「詠史詩」的形式來障眼，簡直就是開門見山的借古諷今。這對於贈詩的對象（包括趙子昂在內，大約全是南士）不啻是一種當頭棒喝。第一首是說，華夏文化的精華都是在大災難以後產生或者發揚光大的：洪水是三代的濫觴，秦火不但沒有毀滅儒家的經典，反而使它們更加彰明較著。至於外來的佛教，則經不起真正的考驗。換句話說，在蒙古征服的災難以後一定還有中興的一日。當時所崇拜的喇嘛教也決不能廢棄萬古文化的主流。這樣的思想，又在引詩第二首中加以重複。他歎息韓愈反佛老의思想和董仲舒「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原則不爲人所注重。在讀這首詩的時候，他所謂的「在朝諸公」無疑會想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等話。當時阿合馬，盧世榮雖已敗，卻是桑哥得勢的時候。「正誼」的提出，顯然是針對那班言利之臣而發。

比較起來，第三首的語氣相當緩和。周公、召公因爲輔佐而分封；蕭何、張良的功績被司馬遷表彰；伯夷、叔齊以義不食周粟；召平在秦亡以後，不再想到東陵侯的身分，一變而爲種瓜的灌園叟了。縱然全詩的主旨是在於強調人各有志，事實上等於在問趙孟頫等人今後何去何從。

在第四首裏，吳澄不加掩飾的表示他個人對於張良和諸葛亮的敬佩。張良佐漢本意只是爲了要替韓國復仇，諸葛亮的出山志在恢復漢室。⁵⁸ 這時的吳澄，很可能還沒有完

⁵⁸ 虞集《輓文文山丞相》詩頷聯：「子房本爲韓仇出，諸葛安知漢祚移」，非常可能是從這首詩化出來的，只是意思已經不一樣了。諸葛一句或許兼指與吳澄這時想法類似的人亦未可知。

全放棄劾法二人的意思，特別是諸葛亮。關於這一點，我們還有旁證。虞集作的吳澄行狀中有以下的一段話：

時，宋亡之證已見，先生以其道教授鄉里。嘗作草屋數間，而題其牖曰：「抱膝《梁父吟》，浩歌《出師表》」。程文憲知其意，題之曰「草廬」。學者稱之曰「草廬先生」。⁵⁹

於此可見他一向對諸葛亮景仰之深，很希望有一個劉先主出來。而揭傒斯所撰神道碑⁶⁰和《元史》本傳⁶¹對於草廬的原意都不加以交待，更露出欲蓋彌彰的痕跡。

第五首詩實際上可以說是第三首旨意的延伸。揚雄在西漢末曾經位至郎官，在王莽篡位後仍以資格老的關係作大夫，更不用提作那篇題為劇秦美新的「符命」了。陶淵明在晉亡以後據說只書甲子。⁶² 二人的高下，自有後人論定。言外之意便是說仕元和歸隱的人會被將來的人「較短長」，此時毋須費辭。

在第六首詩裏，我們可以看出吳澄是在怎樣諄諄的勸說「在朝諸公」。賈誼有才有志，但未能為漢文帝所用，僅僅作到梁王的太傅。魏徵雖然得到唐太宗的信任，以諍諫著稱。然而所諫者仍屬枝節，未能導致太宗制禮作樂，來達到三代之治。賈誼有高志而不見用，魏徵得用而志不高，可見君臣的際遇是多麼難。以此質諸當時在燕的諸公，又當作何感想？

「箕疇八政目」一詩似乎是在反對元朝不斷的用兵。當時征日本、緬甸、占城諸役已告一段落，伐安南的事也近尾聲，但乃顏的叛亂正方興未艾。詩中說「末師首食貨」應即是主張「黎民不饑不寒」的意思。這也與他那首反言利的詩相呼應。

第八首詩用了《周禮》、⁶³《春秋左傳》⁶⁴和《邵氏聞見錄》⁶⁵三書中的材料。

⁵⁹ 《道園學古錄》卷四十四，頁五上。

⁶⁰ 《吳文正集·附錄》，頁五十五下。碑文不見於今本《揭文安全集》中。

⁶¹ 《元史》卷一百七十一，頁八下。

⁶² 這一點的不正確，前人早已辨明，但吳澄顯然是受了《通鑑綱目》的影響。「莽大夫」、「晉徵士」都是《綱目》的書法。參看許有壬《至正集》（河南教育總會石印本）卷三十，頁二上。

⁶³ 《周禮》（《四庫叢刊》本）卷十一；頁三上：「鸛鷖不踰濟。」

⁶⁴ 《春秋集傳》（《四庫叢刊》本）（昭二十五年）卷二十五，頁六上：「有鸛鷖來巢」，同卷頁八下《左傳》：「有鸛鷖來巢，書所無也。」

⁶⁵ 邵伯溫，《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學津討原》本）卷十九，頁六下——七上：「康節先公先天之學，伯溫不肖，不敢贊。平居於人事機祥未嘗輒言。治平間，與客散步〔洛陽〕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故，則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有所主。』客曰：『何也？』康節先公曰：『不二年，上用南士為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客曰：『聞杜鵑何以知此？』康節先公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春秋》書六鷖退，鸛鷖來巢，氣使之也。自此南方草木皆可移，南方疾病瘴癘之類，北人皆見（在苦之矣。』至熙寧初，其言乃驗，異哉！』這段話，不但表示邵雍對於王安石新政的偏《聞見前錄》中反新政論點甚多，茲不具引。）更可以注意的，便是其中所反映出的南北地域偏見。而這種偏見，頗引起後來同情王安石的南方人的反感。劉將孫《養吾齋集》（《四庫珍本》初集本）卷六，頁八下，《臨川荆公祠堂》一詩「天津有客攢眉早，洛下何人著史忙」的譏刺，足以證明此點（其中把司馬光的反對王安石也帶了一筆）。吳澄雖然曾於大德九年（一三〇五）「較定」邵雍的著作，（見《道園學古錄》卷四十四，頁六下——七上）但他欣賞邵雍實在是他易學方面的成就，對於這種「南士亂政」（特別是對他同鄉王安石）的觀點是不會接受的。

《周禮》和《春秋》二則的含義都指南北飛禽例不相互踰。《聞見錄》中邵雍的「預言」，顯然暗示從南方去的王安石用新法亂了朝政。吳澄本人崇拜王安石的學術，⁶⁶ 又是臨川人，自然在詩中不會與邵雍採取相同的論點。（吳澄欣賞邵雍的學問，則是南北之見以外的事。）事實上，是帶着一點諷刺的意味的。因之，他在這首中似乎在表示：既然「禽鳥得氣先」，南方的鳥在正常情況之下不應去北方。尤有進者，北方人對於南方人常有偏見，例如邵雍之於王安石。根據這些，「大事可知矣」！然則諸位南士還在燕京存望甚麼呢？

在第九首詩裏，他用了「元后」和「神皇」兩個名辭，二者其實是一回事。「元后」本出於《尚書·大禹謨》，⁶⁷ 但在這裏卻應解作「元朝的統治者」。「神皇」似乎是從北魏始祖神元皇帝而來，⁶⁸ 此處應指成吉思汗。我們的理由是，北魏和蒙元都是以異族入主中原，北魏的始祖雖沒有像成吉思汗一樣征服中原，但二人統一諸部落，奠定了以後帝國的基礎則是相似的。而且北魏的皇室後來又將本姓從「拓跋」改為「元」，這和從「大蒙古」改為「大元」可以相提並論。有了這樣的理解，這首詩的含義便可以明白了。他其實是在感嘆：成吉思汗作了皇帝，異族的蒙元統治着全部中國，這真是史無前例的事。既是三千年以來「書傳」中所未有，難道還應當去事奉麼？

這些詩是在舟中作的，所以他在第十首裏（也是廿五首中的最後一首）用了水的形象：當前的政局，就像急浪的險惡和黃流的渾濁。因此，最好不要到河的彼岸去參政，否則便會像「篋篋引」裏所說的白首狂夫一樣，「渡河而死，其奈公何！」至於傳授先王之教和聖人之道的問題，那倒是不必擔憂，因為「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根據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作一個簡短的綜合。吳氏寫這些詩的目的決不僅僅在於發洩胸中的鬱瀆，而是要向那些在燕京的南方知識份子表明他的心迹，並藉此解釋何以他無意留下來的緣故。很明顯的，當時最使他耿耿於懷的有兩點。第一，雖然南宋已經亡了，故國之思、民族觀念和地域偏見仍在阻止他出仕。第二，那時燕京的氣氛無論在那一方面都和他那種極端儒家的氣質和學養是扞格不入的。⁶⁹ 趙孟頫引他臨行前的話

⁶⁶ 此點參看《吳文正集》卷九十七，頁十一上——十二下。吳澄在《登撫州新譙樓》的詩序中說：「至順壬申，十有一月，下弦之後，登新譙樓。緬懷王丞相、陸先生之流風，成古詩一章。奉呈同志諸友」。詩中有「吾邦山水秀，雄麗冠江右。……懷哉二前聞，吸料得醇厚」等句。虞集在這首詩的後記中也說：「陸先生、王丞相，寥乎天地之間氣，卓乎千載之豪傑。殆非臨川山水所得而私者也。然而臨川有如是之父兄君子也，豈他郡之可望哉！」在在都可以看出吳澄對於荆公之服膺。

⁶⁷ 《尚書》（《四部叢刊》本）卷二，頁四上。

⁶⁸ 見《魏書》（開明本）卷一，頁五。

⁶⁹ 即使連當地的自然環境也使他不滿。他在題為《燕城》（注意：此處用「城」而不用「京」或「都」字）的七律中說：「燕絡中原東北去，吳通上國古今奇。五千里外只如此，數百年來幸見之。弔望諸墳吾有淚，擊漸離筑世無知。西山綿互三關險，日日氈車鐵馬馳。」不但全詩表示出鄙夷之意，頸聯還一方面哀宋，一方面反元。詩見《吳文正集》卷九十四，頁三上。

說：「吾之學無用也，迂而不可行也。」（見前）所謂「迂」、「無用」，只是針對當時的局勢而言，並不是真正價值判斷。否則他絕對不會有「其如予何」的意念存在，這是可以斷言的。

在結束討論「感興詩」以前，還有一個相關的小問題需要解決，那便是吳澄和程鉅夫間的友誼。根據虞集作的《行狀》和危素所撰《年譜》，⁷⁰ 吳澄十六歲時（一二六五）就學於程若庸，即與若庸的姪兒程鉅夫「同學為友」。到作詩的那一年（一二八七），二人已有了二十年以上的交誼。但詩的短序說：「舟中寄子昂及在朝諸公」。趙孟頫是他的新知，程鉅夫不但是舊交，同時一手促成了他訪燕之行。到達以後尚不斷「力薦」。序中提趙而不及程，恐非無故。事實上，這時程的進取（或者可說是熱中）與吳的澹泊有很大的對比。吳澄在離燕南歸以前作了一篇《別趙子昂序》，並附五古一首，⁷¹ 表示對於趙氏在文學、經學、書法和音樂等方面造詣的激賞。於此可以見到他們短期相識中氣味相投的情形。對於程鉅夫，吳澄可能在這段時間中有一點「道不同，不相為謀」的感覺。因之，對他與對趙孟頫的情感不大一樣。（趙至少表面上說「今為籠中鳥」一類的話。）為了證明這一點，讓我們把他在離燕前寫給程鉅夫的一篇文章引在下面：

集賢學士程公十年於朝，日近清光，而親舍乃數千里。今以行台侍御史得旨南還，庶幾便養。而回望闕廷，又二千里外。日以近者，人子之樂。日以遠者，人臣之憂。此遠齋（程鉅夫的齋名之一）所為作也。夫忠臣孝子之眷眷於君親也，一以朝夕左右為樂，然亦難乎兩全矣。子之愛親，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無所逃於天地間。惟其所在而致其道，豈以遠近間哉？余既從公觀光上國，又將從公而南。與公同其樂而不同其憂者，思有以紓公之憂焉。……⁷²

其中說到「將從公而南」的話，然而從兩人的傳記材料裏，並不能找出他們是結伴南歸的。這篇文章最引人注目的一點便是它的口氣與前引寄趙子昂諸詩的口氣絕異，而二者竟作於同時同地。詩中激昂慷慨與悲憤的情緒不但不見於此，而且在二者上下文中，「清光」、「闕廷」、「忠臣」和「西山二子」，「子房為韓」等是絕不相容的觀念。我們對於這樣的矛盾，只能解釋作吳澄當時並不想對程鉅夫表白自己的心境，因為程早已一面倒了。這也就是說，不論當時程鉅夫是否仍在燕京或已去南方就新職，這些詩的

⁷⁰ 參看《道園學古錄》卷四十四，頁四上；《吳文正集·附錄》，頁五下——六上。

⁷¹ 《吳文正集》卷二十五，頁四上——六下。

⁷² 《程雪樓文集》（中央圖書館影印本）卷十一，頁一上。

對象都不包括他在內。話雖如此，他們的私交卻始終不渝。⁷³

另外一方面，吳澄的反抗思想畢竟由於時間的過去和環境的變遷而被沖淡了。讀了下面的詩，我們就可以覺察到這種傾向：

《和答枝江令何朝奉》有序

枝江知縣何朝奉在桃源別墅有詩貽贈。時予服道士服，讀書巴山⁷⁴之陰。何詩末句云：「洒上簪冠終不作，子房久矣赤松遊。」用韻奉答四首。⁷⁵

生平關老稟如秋，一旦番成老氏儔。晉士無心入蓮社，楚纛有興託丹邱。遁身詭姓聊依附，詖行淫辭甚寇讎。土木形骸雖混俗，高人靈府與天遊。

戰國於今有幾秋，韓臣有子莫能儔。傷心牛後資談柄，枚淚虎許⁷⁶成故邱。袖鐵沙中非失計，授書圯上遽忘讎。簪冠縱有興王分，良豈甘從赤帝遊？

世無孔子作《春秋》，良遂儕諸平勃儔。天授雖然遇龍德，棧燒總是首狐邱。非為漢用為韓用，既報秦讎報項讎。不是功成身始退，早年黃石已從遊。⁷⁷

枝江縣在湖北，可惜行狀和年譜都沒有提到他何時去過湖北。序和詩中可以注意的有以

⁷³ 例如程鉅夫在大德九年（一三〇五）任翰林學士時，修建了一所「晉錫堂」以示慶祝，吳澄特別為之作記（見《吳文正集》卷三十五，頁十九上——二十上，又見《程雪樓集·附錄》，頁十二上——十二下）。吳澄母親在世時，程鉅夫作有壽詩（《雪樓集》卷廿六，頁七下）。程鉅夫並為吳家的「正中堂」作記（《雪樓集》卷十二，頁十上——十下）。程氏七十歲生辰，吳澄在慶筵上即席作賀啓（《吳文正集》卷十四，頁五下——六上）。吳澄又替程氏的孫子程世京（即《雪樓集》中所附年譜之作者）命字，見《吳文正集》卷十，頁二上——二下。

他們兩人由於氣質不同，影響了終身的事業，這當然是可以瞭解的。吳澄有一次寫信給程鉅夫，指摘他和別的在朝的人在位日久而仍不能副天下之望，並且直率的問他是否曾經想到多任命一些廉潔的地方官。（《吳文正集》卷十一，頁一上——二上）程氏於江南湖北道廉訪使任內，曾在他的廳事之後築亭一座，命名為「歲寒」，並有詩文記事，言下甚為自得（見《雪樓集》卷十四，頁四下——五下；卷二十七，頁十六上）。吳澄有詩，題為《次韻湖北程廉使訪歲寒亭，亭在黃鶴山下，有柏一株、竹數莖》（見《吳文正集》卷九十七，頁一上——一下）：「黃鶴飛不回，蒼柏乃小住。千年歲寒姿，深藏翳榛蕪。偶然別荒穢，幽意畢呈露。生來本孤特，強使此君附。作亭以面之，相對澹無語。雖蒙新知厚，頗若違余素。人間無霜雪，天上有雲霧。政恐挾風雷，一夕化雷去。」他的意思似乎是：孔子早已說過「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柏樹既是自然在此長成，何必強加人工來植竹修亭？此舉對於柏樹本身而言，實在沒有任何意義。這不僅掃了程鉅夫的興，「新知厚、違余素」恐怕還有雙重意義在內。

⁷⁴ 在湖北長陽縣南，參看《讀史方輿紀要》（新興書局影印本）卷七十八，頁二十九下。

⁷⁵ 今錄三首，因為第一首純屬酬應套語。

⁷⁶ 「許」字疑誤。

⁷⁷ 《吳文正集》卷九十六，頁四下——五下。

下幾處：第一，知縣何某身為元朝命官，卻喟嘆沒有類似漢高帝的人物⁷⁸出來抗元，遂令有張子房才能的吳澄在「山中習靜」。這未見得不代表當時若干南人的思想。第二，吳澄本人這時仍以「晉士」、「楚纍」自況，表示願意習道而無心奉佛，這還是有排外的用意。第三，雖然他感嘆事「秦」(元?)是可恥的行爲，但是興復時機已失。此時縱有人出來起義，他已經不願參與了。第四，他認為歷史中張良的所作所爲遠在其潛力以下。然而受了環境限制，只得與陳平、周勃輩爲伍，結果仍不過如此——雖然報仇的目的最後總算達到了。這種看法並不同於傳統一般的看法(例如蘇軾在《留侯論》中的觀點)。惟其如此，我們便可以感覺到吳澄的態度，已經漸趨消極，同時也存在着一點矛盾：他自己的時代，當然也多少是一個「亂臣賊子不懼」的時代，那麼他這個張子房，既不甘心從不學無術的「赤帝遊」，難道就去「從赤松子遊」麼？恐怕也是不願意的。這種心理，便促成了他日後終於出仕的行動。⁷⁹

從吳澄第一次離燕(一二八七)到他回京就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的官職之間共有十五年的時間。這時元朝統治的局面不用說早已成定局。而且桑哥輩言利之臣也在朝廷中消逝。此外，他接觸到的一些北方儒士(例如元明善)對於他應該有相當大的影響。元明善恃才傲物，自視極高，⁸⁰對吳澄卻執禮甚恭。而吳澄遇見他時，就已「視其才氣壓羣，於諸經諸書爬剔糾結，貫穿端杪。其吐辭也，雄以則。期其文學，必爲中州第一。」⁸¹經過元明善，吳澄得以認識董士選。後者從大德之年(一二九七)起就不斷向中朝推薦吳澄。⁸²這時的吳澄，頗有知遇之感，作有《壽董中丞》一詩如下：

直氣貞心命自天，風霜老柏正蒼然。將千萬世壽吾國，先五十年生此賢。甲子肇新初日度，丑辰依舊斗星纏。邦基身世同悠久，敢賦崧高第二篇。⁸³

此詩乃是頌董士選五十大壽之作，應是大德六年(一三〇二)寫成的。⁸⁴他在頭一年還回信給董士選，推謝應奉翰林文字的任命。信中引了邵雍的詩句「幸逢堯舜爲眞主，且教巢由作外臣」，表示沒有出山之意。⁸⁵但在作壽詩同年的八月，便動身赴京師上任去。

⁷⁸ 「籐冠」爲劉邦特製，見《漢書》(開明本)卷一，頁四顏師古注。

⁷⁹ 當然，在讀這幾首詩時要考慮到他受了在倡和時用韻的限制，而且兩人都在環繞着張良「欲從赤松子遊」的題目大做文章，但詩的主旨仍是顯而易見的。

⁸⁰ 參看張養浩《歸田類稿》(《四庫珍本》三集本)卷十，頁十五。

⁸¹ 《吳文正集》卷六十四，頁一下。

⁸² 《道園學古錄》卷四十四，頁六上。

⁸³ 《吳文正集》卷九十五，頁三上。

⁸⁴ 據吳澄所撰神道碑，董士選卒於至治元年(一三二一)，得壽六十九歲。見《吳文正集》卷六十四，頁十五上。

⁸⁵ 同書卷十一，頁五下——七下，《復董中丞書》。

雖說是「有司敦迫久之」，士選勸說的影響恐不在小。詩中的「吾國」、「邦基」當然已是指元，更為觸目的，是詩中最後一句把董士選的父親董文炳比作《詩經·崧高》中的申伯，「登是南邦，世執其功」。⁸⁶即使是慶壽，我們不能說這不在反映他對董氏一門安定南方業績的極端欽佩。⁸⁷同時，這一次他赴任因為時間延誤，吏部早已派定了繼任人選。董士選「抗章」說「似失朝廷崇儒重道之禮」（見年譜），無疑對他是相當感動的。⁸⁸「禽鳥得氣先」的感情，這時大約也相對減少了。

除了董士選以外，對於吳澄作出仕決定有影響的，可能還有一人，即是阿魯渾薩理（Arghun Sharif）。趙孟頫作神道碑中又稱他作「全平章」，曾勸世祖「治天下必用儒術，江南諸老臣及山林藪澤有道義之士，皆宜招納，以備選錄。」⁸⁹他自己曾作書吳澄，深致此意。原信中內容已無法盡知，但從吳澄的覆函中還可以窺測一二：

某自聞閣下保釐大江之西，深為兩道⁹⁰士民幸。惟是老病之軀，筆硯荒廢，不敢容易奉輿居狀，以瀆崇嚴。忽辱先施，存問備悉，且致香供於深山之野人。似此厚意，非所宜蒙。感謝感謝。又承付下彥祥廉使之書，尤見盛心。第臺耄之年，言不足采。何以發逸民之潛德，稱人子之孝思乎。炎暑中低垂昏倦，報字殊愧簡率，末期參覲，敢冀為明時，厚加保愛，不具。某再拜。⁹¹

吳澄回書中「發逸民之潛德，稱人子之孝思」，應是援用阿魯渾薩理原信中的句子。當時他只以年老為辭，顯然並不是很強有力的理由，因為這時他還只是五十歲左右的人（他第一次於一三〇二年赴燕就任時才只有五十四歲），自稱臺耄，未免有一點過甚其辭的味道，也可能是言不由衷。無論如何，他對於阿魯渾是相當感激的，否則便不會寫出下引《壽全平章》的詩來：

春秋一萬八千指，《道德》二卷五千言。祝公壽數亦如此，孔老遺芳永久存。⁹²

⁸⁶ 《毛詩》（《四部叢刊》本）卷十八，頁十五上。

⁸⁷ 這種態度在他為董士選作的神道碑銘中也很明顯：「……忠臣報君，孝子從父。不殺如彬，底定南土。……立朝正色，侃侃文儒。……薦賢為國，匪私私恩。公不自多，眾或鮮知。」（《吳文正集》卷六十四，頁十六下）

⁸⁸ 元明善作有《吳幼清先生南歸序》（《國朝文類》卷三十五，頁一上——二上）畫蛇添足的解釋何以吳澄遲遲赴任及何以「執事者以官曠別授」，這與董士選的「抗章」，頗有雲泥之別。

⁸⁹ 《松雪齋集》卷七，頁十二上——十六上。本傳見《元史》卷一百三十，頁十五上——十九上。

⁹⁰ 此處「兩道」當係指江西湖東道和江南湖北道兩處廉訪司而言。

⁹¹ 《吳文正集》卷十三，頁一上——一下。

⁹² 同書卷九十二，頁三十四下——三十五上。

按神道碑，阿魯渾死在大德十一年（一三〇七），⁹³ 他本人又未赴南方，因此，詩一定是在吳澄停留在京師的短短幾個月中（一三〇二年冬至一三〇三年春）所作，目的不會沒有感謝他招致的一番好意在內。就詩論詩，這一首實屬下乘，然而卻有助於瞭解吳澄的心理。他是希望像阿魯渾這樣的人能壽考，作為士人的屏障，他們然後才會「吾道不孤」，「吾將仕矣」。⁹⁴

自此以後，吳澄曾作朝官兩次，一次任國子監丞，旋升國子司業（一三〇九——一三一二）。⁹⁵ 另一次被授翰林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又任經筵講席（一三二三——一三二五）。⁹⁶ 這時對於元廷的觀感，當然已經不是和寫《感興詩》時可以比擬的，例如《朝回再次韻》：

風吹僊樂下瑤臺，闔闔中間翠輦來。雲擁紅光千丈遠，日行黃道九天開。百官星拱環金闕，萬壽雷聲追玉盃。已觀太平新氣象，四方犴獄長春苔。⁹⁷

此詩雖不能與那些「早朝大明宮之作」相伯仲，但以南人入仕的吳澄，這時已不復有像庾子山「聞隴水而淹泣，向關山而長嘆」⁹⁸ 一般的心情，卻要効法賈至，去「朝朝染翰侍君王」了。⁹⁹

然而吳澄基本上還是一個純學者，不宜於出仕。他的學生危素曾經說：「公生於淳祐，長於咸淳，而斯何時也？乃毅然有志拔平流俗，以徑造高明之域。宋既內附，隱居山林者三十年。研經藉之微，玩天人之妙。朝廷歷聘起，或不久而即退，或拜命而不

⁹³ 《松雪齋集》卷七，頁十三下。

⁹⁴ 這樣的心情在另一首詩，《寄董平章》中表現得更清楚：「偃蹇百圍柏，受命雄以剛。……相期天久長，為世作保障。天空澹無雲，熒煌泰階平。太微有垣衛，今近少微庭。」這也就是說，知識分子如有像他們這樣有力量的人來支持，才能發揮出作用來。

⁹⁵ 當時有的南方儒士以為這是殊榮。劉岳申《申齋劉先生集》卷一，頁一下：「或曰：『官無卑，君命也。以君命教胄子，先生之任不既重已乎。方今出宰大蕃，入為天子左右大臣者，皆世胄焉，以故中州之人雖有傑然者，不在是任。然則南士愈不敢望矣。』」

⁹⁶ 此次劉岳申寫信給他說：「江南儒者遭時得君，未有如明公今日者矣。此天所以報明公平日問學之勤，記覽之富也。明公何以慰天下之望哉？明公宜為江南衣冠儒士增量，為臨川鄉國經學增光。」（同書卷四，頁一下）從這些都可以看到當時南士對於他期望之高。

⁹⁷ 《吳文正集》卷九十五，頁十九下。

⁹⁸ 庾信《哀江南賦》，《文苑英華》（中華書局本），第一冊，頁五九四。

⁹⁹ 他所作的制誥（《吳文正集》卷九十）自是名副其實的「染翰侍君王」。他在《擬賀〔泰定帝〕登極表》（同卷頁七上——八下）有這樣的話：「不崇朝而致泰，姦慝悉除，如皎日之方升，幽微畢照。……僉云遭逢堯舜之君，何止超越漢唐之治。」在《經筵講議》（同卷頁十二上）中說：「我世祖皇帝不愛殺人之心，與天地一般廣大。比似漢高祖不曾收服的國土，今都混一了。皇帝〔指泰定帝〕依著世祖皇帝行呵，萬萬年太平也者。」在《次韻魯司業》詩中又有「小儒忝綴班行末，咫尺龍顏奉玉音」等句。當年「書傳三千年，未有如此者」的豪氣至此已消磨殆盡了。

行。要之，無意為世之用。著書立言，以示後學，蓋燦然存乎簡編。」¹⁰⁰這是很中肯的話，同時也說明了何以吳澄「出」的時間要比「處」的時間少得多。事實上，他給我們的印象是他解職還家就像是如釋重負：

昨日辭京國，通州岸下船。年年此初度，度度似今年。快活神仙地，權愉父子天。小成重八數，圓滿大三千。¹⁰¹

這是他離開國子監司業職位時所作，詩的用字極為淺顯。同時也就是因為這個緣故，他當時輕鬆的情景更能躍然於紙上。細察行狀，年譜等材料，他這次的離京是由於對學生考績的問題與同事意見不合，¹⁰²因此在船上過生日時「手之舞之」的心理狀態似乎更可以令人瞭解。但是我們還想進一步探討為甚麼他在結尾時如此的樂觀說：自己滿六十四歲時稍有成就，整個世界也沒有問題。這難道純粹是詩人的誇大？

蒙古人以異族入主中州和江南，在開始時的確有不少人是不甘心作順民的。女真覆滅時，據說「士大夫死以十百數。自古國亡，慷慨殺身之士，未有若此之多者。」¹⁰³南宋之亡，文天祥、謝枋得等人的忠義，更是盡人皆知的事。然而各朝正史中的忠義列傳終究只代表了極少數的一部分人。即以昭忠錄裏的一百多人來說，和當時全國知識份子人數的比例仍舊是「泰山一毫芒」而已。¹⁰⁴剩下來的這些沒有慷慨赴死或是從容就義的讀書人中，不用說有一部分已絕意仕進。他們私下對於新建立的征服王朝到底態度如何，現在由於材料缺乏，很難作到準確的觀察。舉例來說，程鉅夫奉派去江南訪賢，向朝廷推薦了二十餘人，¹⁰⁵其中包括何夢桂和方逢振，「上皆擢居清要之職」。¹⁰⁶程、何、方三人曾有唱和之舉，可惜我們能看到的，只有以下所引何氏的三首詩：

《雪樓程御史次方山房韻見寄、用韻答賦三首》

萬物委橋運，逝水無回波。美人渺何許，道遠空寤歌。願言結瑤珮，乘虬下陽阿。陽阿有瑤草，為我起宿痾。行行望高臺，日暮將奈何？
青樓有蛾眉，翳袖渺獨處。日暮賦標梅，愧我求彼士。誰家操孤鸞？感此中夜

¹⁰⁰ 危素《危太樸集》（嘉業堂刊本）《文續集》卷一，頁十三下——十四下。

¹⁰¹ 《壬子自壽》，《吳文正集》卷九十三，頁十二下。

¹⁰² 同書《附錄》，頁十六上。

¹⁰³ 《道園學古錄》卷五，頁三下。

¹⁰⁴ 根據謝枋得的統計，元初僅福建建安一地即有兩萬以上的「科舉士」（見《送方伯載歸三山序》，《乾坤正氣集》本《疊山先生文集》卷一，頁十九上），這個數字不一定可靠，但可以相對的看出來當時士的數目之多。

¹⁰⁵ 謝枋得在《上程雪樓御史書》中說：「執事薦士凡三十，賤名亦玷其中。」（同書卷一，頁一下），數目與此稍異。

¹⁰⁶ 見揭傒斯作《雪樓先生程公行狀》，《程雪樓文集·附錄》，頁三下。

起。明河落天西，玉繩低欲輕。結言藉媒勞，恩重報無地。明珠在羅襦，誰能諒心事？

思君隔山陂，矢心誓白水。夔蛟各自憐，人生貴適意。馬頭黃金羈，不易牛背睡。白髮難再玄，百子空自許。南山或可移，愚公有孫子。堪輿浩無窮，俯仰一寤寐。¹⁰⁷

第一首顯然是說，萬物都有新的開始，元朝也是一樣。宋朝已一去不復返，只有流落在北方的幼帝，徒增人的悵惘。現在你程鉅夫雖然可以信任，又承你推薦我，但是「高台多悲風」，而且時不我與，已經不能出仕了。

在第二首中，何夢桂一方面將他自己比作小姑娘獨處，然而老了才有求他的「庶士」，就覺得不大合宜。另一方面，又比作「事夫誓擬同生死」的節婦，只能感謝程的薦引，卻不能接受他的好意。

對於程氏而言，第三首詩無疑最使他難堪。「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君」字的雙重意義，自是一眼就可以見到。（第二句所用晉文公向子犯起誓的典故，在此也有模稜的意思。）他說程氏的同情他，雖像「夔憐蛟」，但是，「蛟」卻「憐蛇」。人各有志，不可以勉強。以他自己來說，顯貴並不能代替隱逸。而且他年紀已老，一切希望都不存在，何況是要他去事奉異族的君王。¹⁰⁸至於他所懸的鵠的（恢復？），可能並不切實際，此生或難實現，卻尚有子孫在。宇宙無窮，個人的成敗得失都不過只是轉瞬間事而已，不必憂慮。（如將最後一句的含義加以引申，他或許在暗示宋朝滅亡和元代興起也都只是黃粱一夢。）全詩的用字雖很宛轉，其實等於在說：「我有我的操守，你程某人大可以不必多事！」這個釘子碰得也就不算軟了。

¹⁰⁷ 何夢桂《潛齋文集》（《珍本》五集本）卷一，頁十上——十下。當時南士對由南人出身驟據要津而又衣錦還鄉的程氏似乎不無反感，持這種態度的不止何氏一人。方回有《送程侍御文海二首》：「乘傳來江表，觀風遍斗南。年豐仍物貴，民瘠為官貪。浩浩良難測，元元恐弗堪。二星奏天陸，勿謂此常談。大門賢叔父，共載曲江春。談笑今如夢，東南有此人。竹林猶小阮，蓮社已遺民。老死看公等，煙霄要路津。」（《桐江續集》卷十二，頁五下）其中直斥地方官貪污，與吳澄如出一轍（見注七十三）。說他乘傳到南方來觀風，自然含有譏刺的意思在內。但詩裏對程氏最不客氣之處則是他倚老賣老的態度和對程氏叔侄的品評。「賢叔父」（程飛卿，見《雪樓集》所附《程鉅夫年譜》頁一下）「共載曲江春」指他在宋代景定三年是與方氏本人同時登第的，言外之意當然是不齒他降附元朝，因此才強調「東南居然有這樣的人」。將他們叔侄二人比作阮籍、阮咸雖褒實貶（「猶小阮」等於說他似是而非），而將自己擬為加入蓮社的劉遺民更是在於分辨清濁，「遺民」二字的入詩顯然是有意的。最後用「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的意思來作結簡直就是在肆無忌憚的罵人了。

¹⁰⁸ 「百子空自許」一句，似乎仍是以婚姻為譬喻而有不贊成的意思。程大昌《演繁露》（《學津討原》本）卷十三，頁十二上——十三上：「唐人昏禮多用百子帳，特貴其名與昏宜，而其制度則非有子孫眾多之義。蓋其制本出戎虜，特穹廬、拂廬之具體而微者耳。……唐德宗時，皇女下嫁，顏真卿為禮儀使……獨言氈帳本北虜遺制，請皆不設。」

根據這三首詩的題目，我們知道最先是方逢振（山房）寫詩，程鉅夫步韻回答，最後才由何夢桂「用韻答賦」。令人惋惜的是我們在程氏的《雪樓集》中竟找不到這樣的詩。《雪樓集》是程氏的兒子大本和孫子世京親自編輯的，¹⁰⁹應該不致發生遺佚的事。一個可能的解釋便是這次的詩文往還對於程氏並不見得有光采，因此便沒有被包括進去。¹¹⁰方逢振本人，則根本沒有文集傳世，只有在他哥哥方逢辰的《蛟峯文集》裏，附有寥寥可數的幾篇他的文字。¹¹¹其中雖沒有與程、何二人唱和之作，倒是有以下兩首與我們討論的題目有關的詩：

《至元廿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得宣命詣朝，〔盧〕可菴有詩，不敢當，次韻以謝》

雪棹殷勤泛剡溪，吟香爲拂案頭埃。老軀久已乞骸去，瘦骨應難入畫來。但願東皇憐病瘦，早從西華覓雲臺。當年自是渠無分，明主何曾棄不才？
抱琴來會錦沙溪，音響能清一世埃。不學晉人反招隱，頗知陶令欲歸來。羨君雪裏騎驢興，哀我年前戲馬臺。留取老翁看雲月，乾坤撐拓賴奇才。¹¹²

這些是步韻和盧珏的詩《賀山房先生得宣命》的。原詩如下：

自從驄馬到清溪，淨洗江山絕點埃。霜月高擎隨地轉，春風吹喜自天來。皇華禮遣榮花縣，宣命恩濃出柏臺。海內蒼生望霖雨，廟堂正要棟梁材。¹¹³

盧氏雖然在宋代中過進士，這首原詩不用說是相當俗，一望而知是充滿了「感皇恩」的思想。針對着這一點，方逢振覺得「不敢當」而連和兩首。其中所用雪夜訪戴、孟浩然、陶淵明等典都無非是在拈出一個「隱」字，而歸結說自己不中用，希望朝廷另請高明。其中兩提孟浩然，當然決不是在暗示「欲濟無舟楫」，而是要盧氏聯想到「只應守寂寞，還掩故園扉」的概念。事實上，他的意思是他與孟浩然基本上不同。孟自怨「不才明主棄」，他卻已被朝廷召用；孟「徒有羨魚情」，他則是自甘寂寞。至於國家大事，他的能力不足，需要倚仗別的「奇才」。第二首的頸聯上半聯表面上似乎在稱讚

¹⁰⁹ 見歐陽玄《雪樓文集序》頁二下——三上，載於中央圖書館影印本《程雪樓文集》，而未收入《四部叢刊》影印的明成化刊本《圭齋文集》中。

¹¹⁰ 註七十三中所引吳澄所作《次韻湖北程廉使訪歲寒亭》的詩和原詩也都沒有收入《雪樓集》。相反的，姚燧所贈的一首詠歲寒亭的詞（《雪樓集》卷三十，頁十七上）倒是收進去了。蛛絲馬跡，似可看出編者在去取之間應是頗費周章。

¹¹¹ 方逢辰《蛟峯文集》（《四庫珍本》四集本）卷八，頁一上——十八下。

¹¹² 同書卷八，頁十二下——十三上。

¹¹³ 盧珏事跡畧見於《宋詩記事》（鼎文書局影印本）卷七十八，頁二下。盧氏原詩見《蛟峯文集》附《山房外集》頁一。

「可庵」，並且感謝他的贈詩，骨子裏恐怕有指摘盧熱心功名和當年孟浩然一樣的意思。¹¹⁴下半聯則技巧的隱藏了一個「宋」字。¹¹⁵合在一起便無異是說：「你儘管要在新朝中干祿，我卻不能忘懷於故宋。」

但是宋朝終究是「逝水無回波」，像他們這樣的人，既不願意出仕，總還須有別的理想和寄託。所以何夢桂在一首題為《感懷》兼和方逢振的五言古詩中有這樣的敘述：

寒冰不附炭，圓枘豈納方？心同媒易合，分隔意難當。……亡羊兩得失，奚擇穀與臧？齒舌誰墮在，豈計彼軟剛？千年青銅鏡，寧為垢損光？¹¹⁶

他們對新的王朝這時有冰炭不相容的感覺，那麼不論出山的目的是甚麼，「其於亡羊均也」。人到老年，舌存而齒亡，是因為齒剛舌柔的緣故。¹¹⁷根據這個原則，無論「汝曹」運用何種手段，他們都可以無往而不利地去應付。江河萬古的道統，將永遠光芒萬丈。¹¹⁸一旦有了這樣的立場，如果新的政權中有人能出來贊助他們，他們卻也不會由於民族觀念而加以拒絕。相反的，對於這樣的人，他們的評價且遠在對程鉅夫之上。例如何夢桂在《上來谷書隱先生》中說：

反袂歎麟折，過門傷鳳衰。奠楹不復作，世喪禮樂墜。世喪道不喪，文豈不在茲？千載而有人，三代猶可追。吾聞夾谷翁，文獻尚有遺。斯世微斯人，皇皇將安歸？

平生學屠龍，終乃成履豨。國亡身未殞，戮死竟何如？衣帶日以緩，鬢髮日以踈。晨風懷苦心，不能高奮飛。獨抱三聖易，終焉老吾廬。

驢老不適用，狐首復何幾？身名與世隔，誰以告彼姝？哀腸遠難訴，載訴出戶衣。出戶亦不辭，疑我故步非。袖中懷綠綺，自傷知音稀。為君試一彈，霑襟涕連襦。¹¹⁹

¹¹⁴ 蘇軾《大雪青州道上有懷東武園亭，寄交代孔周翰》詩：「又不見，襄陽孟浩然，長安道上驅驢吟雪詩。」見《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四部叢刊》本）卷七，頁九上。

¹¹⁵ 戲馬臺是劉裕在彭城大會羣士之處，見《讀史方輿紀要》卷二十九，頁十下。此處意應為：「可憐我曾參加宋的科舉。」

¹¹⁶ 《潛齋文集》卷一，頁二十三上。除此之外何氏還有兩首同韻的詩，其中的意旨相類。見同書卷一，頁十九下及頁二十二上。

¹¹⁷ 劉向《說苑》（《四部叢刊》縮本）卷十，頁四十五：「常撻……張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亡』。常撻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柔耶？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耶？』」

¹¹⁸ 他們作這些詩確實是在言志而不是無病呻吟，可以從宋濂為魏新之所作的墓誌銘中得到佐證：「〔新之〕所居有垂雲洞，因倡嗜義之士，建垂雲書院。開迪新學，孜孜如不及。講經之暇，與皎峯方公逢辰，潛齋何公夢桂，盤峯孫公僮發為泉石之游，間賦詩以見其志。」（《四部叢刊》本《宋學士文集》，《鑾坡前集》卷三，頁二十二下。）其中雖未提到方逢振，當只是無意的遺漏。

¹¹⁹ 《潛齋文集》卷一，頁七上——八上。六首錄三。

其中「世喪道不喪」一句不成問題是全作的關鍵所在。這個主題之所以在答程鉅夫詩中沒有提出，乃是由於程並不瞭解他們沒有出仕的興趣，¹²⁰好意徒然換來了沒趣。如果我們把兩起贈詩對照一下，就可以感覺出一方面意味着「曲士不可以語於道」，另一方面簡直就是「實獲我心」的傾訴。三首都是平鋪直敘，無須分析。贈詩的對象夾谷書隱就是《元史》中的夾谷之奇，¹²¹本傳說他受業於康曄，《張翥傳》又說他是導江的弟子，¹²²所以黃宗羲的《宋元學案》把他列入了北山四先生學案中。¹²³至於何夢桂及方逢辰、逢振兄弟，¹²⁴則由於方氏家學的關係，¹²⁵與何基——王柏——張翥這一派路數很近。因此，夾谷之奇雖然原籍女真，到南方時又是以元朝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僉事的名義去的，在學問上卻與何、方等人同調。他個人的背景如此，對於宋亡後陷入困境的儒士當然難免有深切的同情和照顧，這樣就引起了何夢桂進一步的稱讚：

一家南北混車書，誰使斯民耳目塗？昔日簪纓今役戶，朝時絃誦暮征夫。邇來風雨無完屋，何處乾坤着腐儒？不意斯文天未喪，鳳凰來後見河圖。
蒼生下土望天仙，乞得君恩易地然。繡斧聿來霄漢上，丹書先到浙江邊。學徒免隸夫征法，官品寧輸戶役錢。愧死支離疑效報，不妨鼓箎樂天年。¹²⁶

按《元史》本傳，夾谷之奇在至元十九（一二八二）年被召北返，而江南儒戶普遍蠲免差役，到至元二十四年（一二八七）以後才開始施行。¹²⁷詩中所稱「學徒免隸征夫法」等等，如果是指至元十九年以前的事，那就很可能是夾谷之奇個人所作的決定（「丹

¹²⁰ 關於何夢桂和方逢振的生平，可看萬斯同《宋季忠義錄》（《四明叢書》本，卷十三，頁八）所引《嚴州府志》中的簡畧敘述。程鉅夫推薦方逢振為淮西北道按察僉事，何夢桂為江西儒學提舉，兩人均辭不赴。程氏行狀中說「上皆擢居清要之職」（姑不論「清要」二字是否恰當），並不十分正確，因為任命和有沒有赴任實在不是一回事，於此也可以見到文人諛墓的技巧。此外，《山房外集》頁二下錄有何昭德《贈山房先生得宣命》詩，其中有「不將鐘鼎易朱紱，要老桐山守白雲。處士一身純是晉，逸民千古尚為殷」等句，更可證明「不赴」的可靠性。

¹²¹ 本傳見《元史》卷一百七十四，頁五下——七上。

¹²² 同書卷一百八十九，頁三下。

¹²³ 《宋元學案》（世界書局本）卷八十二，頁一五六六。

¹²⁴ 方逢辰的生平現存記載較詳，見《蛟峯外集》卷三所附文及翁所撰墓誌銘及黃潛所作阡表。後者亦收入《金華黃先生文集》（《四部叢刊》本）卷三十，頁一上——六下。

¹²⁵ 《宋元學案》卷八十二，頁一五四六——四七，頁一五五七。又《宋元學案補》（《四明叢書》本）卷八十二，頁一百四十四。

¹²⁶ 《和山房、夾谷僉事韻二首》，《潛齋文集》卷二，頁十一上——十一下。

¹²⁷ 參看《廟學典禮》（《四庫珍本》初集本）卷二，頁一上——十二下所載各條。這些詔令與程鉅夫、葉李等人的建白有關，則非何氏始料所及。姚燧在《奎章閣記》中也說：「〔至元〕二十五年，始分降詔，復江淮多士力役。」（《牧庵集》卷七，頁三下）關於儒戶的問題，友人蕭啓慶兄將有專文討論，茲不贅。

書」未見得指免役的詔書而言)。這當然會令何氏一班人感動。此外，通過夾谷之奇的協助，方家宋朝末年在淳安建立的石峽書院得以恢復舊觀。¹²⁸竣事以後，又作《題蛟峯石峽書院》的五言古詩以示祝賀。原詩已佚，只有方逢辰與何夢桂的和詩尚存。¹²⁹兩詩都從儒家發端講起，沒有全引的必要。比較起來，方氏的詩甚為迂腐，同時有點受寵若驚的味道。例如「戶內有洙泗，山中見華勳。光霽挹茂叔，粹盎師伯淳」等句——爲了要捧夾谷之奇，連周濂溪和程明道兩位夫子也被請入詩中派用場去了。何氏的讀起來較有意思，茲錄有關部分如下：

……世喪道未喪；氣盛化自神。無道固耻穀，有道亦耻貧。蛟翁世蒼俊，皇華重諏詢。次公早識面，次第以禮賓。迺聞抗高誼，木石將終身。雲間有山峽，劫火不得焚。石間有書室，雪迹猶未陳。當路風詩書，出此屋壁文。青青集矜風，勗爾小子勤。斯道未墜地，百世知所因。苞栩成集鴉，白茅尙包廬。終期人臯稷，相與帝華勳。中立天地極，再還風俗淳，願言放巢許，使得老轅申。吾爲混沌氏，抑爲葛天民？俯仰慨今古，悠悠秋復春。夜半舟壑移，故者誰其新？

由於書院的重整，可以看出他對於「道」的前途並不悲觀。他一面替方家感謝夾谷氏的協助，一面又替宋的遺民請命，希望當局能讓像他們那些不願意出仕的人有機會自由從事學術上的工作，庶幾能力不致完全浪費。最後兩句的意思似乎是：雖然傳道的工作由於戰亂而有所中斷（《莊子·大宗師》：「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現在誰能繼續呢？自然非像夾谷一類的人莫屬了。

與吳澄最初的態度一樣，何夢桂及方氏兄弟對於勝朝的矢志，是表現在拒絕出仕上。方逢辰曾經明白的道出這種心境：

我觀陰與陽，禪代何時了？不能爲魯連，尙可作商皓。長歌黍離篇，酌酒問旻昊。¹³⁰

何夢桂更師法王炎午生悼文天祥之意，作詩贈給留夢炎，其中有「鍾子未甘南操改，庾公空作北朝悲」，「白髮門生羞未死，青衫留得裹遺屍」等句，¹³¹揭示不甘心爲新朝所

¹²⁸ 牟璣《重修石峽書院記》（《蛟峯外集》卷三，頁三十三）：「至元戊寅〔一二七八〕浙西按察僉事夾谷之奇聿至嚴陵，以書院中更多故，漸至頽廢，命公〔方逢辰〕之子梁爲山長，任其經理。於是所當興修者次第爲之，古意復振。」方回有《石峽書院賦》一篇（見中央圖書館影印本《桐江集》卷一，頁十三——十七），描寫書院在宋代初建時情形，兼及當時科舉之弊，可以參看。

¹²⁹ 方氏和詩見《蛟峯文集》卷六，頁八下——九下，何氏和詩見《潛齋文集》卷一，頁十一上——下。

¹³⁰ 《蛟峯文集》卷六，頁十上，《送潘翠谷》。

¹³¹ 此詩雖見於現存《潛齋文集》卷二，頁三十九，但其中錯字甚多，仍以盛如梓《庶齋老學叢談》（知不足齋本）卷中（下）頁十二下所錄者爲佳。《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編者說此詩「是集不載」，殊爲失考。

漸漸的變得實際起來。這樣的思想，在下面所引的劉將孫的《雜詩》中就可以覺察得到：

楚水浩浩白，楚山悠悠青。人生自失路，山水初何情！重華入愁雲，閭闔環峨纓。快然各千載，笑汝空一生。長風渺湘波，屈恨何由平？
人生無智愚，用舍隨其向。儻能采葑菲，往往見所長。當其未得意，百計無一望。因依豈非命，遇合如有相。張良本為韓，陳平亦事項。
大廈既已顛，一木何能扶。況乃非棟梁，曾不比楛櫨？彼皆無責備，此獨有遺誅。公卿置何地；文字累老儒。寂寞揚子雲，見稱莽大夫。
六姓更逐鹿，南北沸閭鼎。熾然臚九錫，紛若夢一頃。何者非奕棋，乃有愧未泯。姪嘲子廬墓，史諂士不遜。如何千年齒，獨笑彥回冷？

作者劉將孫的生平，只有從他的文集裏可以得到一點不完全的材料。他生於寶祐六年（一二五八），死在泰定二年（一三二五）以前，是宋末文章名家廬陵劉辰翁的兒子。入元以後經過東平徐琬的介紹，得以任福建延平路儒學教授。又曾授江西臨汝書院山長，可是沒有就任。他與汪元量有文字之交，¹³⁶集中與另一廬陵文士趙文唱和之作尤多，充滿了銅駝荆棘之思。由集中《放榜》一詩看來他可能參加過延祐科舉，¹³⁷但是顯然未中。

首先我們想指出，這些題為《雜詩》的一共有二十七首之多。由於他和吳澄很熟（吳澄在他死後曾為他的文集作序，其中說「吾與尚友〔劉將孫字〕善，素喜其文」），同時在用字上頗與吳澄的《感興詩》相似，我們有理由相信他是讀過那些詩的。同樣的，這些詩用的典都是史實，而感嘆的多半都是宋末元初的事。詩中典故並不十分難以掌握，但有些詩一時不易看出是指那些特別的人與事，有的則含義明顯而與本文論旨無關。因此只選了以上四首，以見一斑。

在「楚水浩浩白」一首中，劉氏由「山形依舊枕寒流」的感慨而想到流亡並且可能已死去的德祐帝。同時在故都臨安，出現了一批新貴，這就更增加了他個人的憤懣。最後他以屈原自況，仍然是表示不忘宋和對於故國的悼念。

我們可以說在「人生無智愚」裏，他道出了當時不遇的讀書人的心聲。那時科舉未行，仕進之路斷絕，很多人只有棄儒習吏，以為進身之階。於是他從「天生我才必有用」的觀點出發，認為元朝用人，不應該考慮到他們「南人」的背景（《詩經·邶·谷風》「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而應該「惟才是舉」。一旦被任命以後，這些人必能有所成就。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這首詩的最後兩句。我們記得，吳澄在他的詩裏有「子

¹³⁵ 他的父親劉辰翁曾經選評汪元量的《湖山類稿》，收入《武林往哲遺著》前編。

¹³⁷ 見《養吾齋集》（《四庫珍本》初集本）卷六，頁九上。

房為韓心，孔明興漢事」的字句，重點放在復仇和恢復上。這裏劉氏也用了同樣的典故，但是用意竟大不相同了。劉氏的意思是：雖然張良最初的目的是為韓報仇，陳平的事業是從奉事項羽開始，但是兩人後來都對漢朝作出了極大的貢獻。這等於一方面在說宋朝的遺民對於元朝也會有貢獻，只要給他們以機會；另一方面又說，既然別的可能性都已不存在，像他自己這樣的人惟一的出路就是設法在新朝中服務。換句話說，他是在為出仕而尋藉口。吳、劉二人是朋友，年紀相差不多（吳澄出生於一二四九年，只比劉將孫大九歲）。他們詩裏的觀點並不表示意識上有基本的歧異，而是由於吳氏的詩作於一二八七年，距離厓山兵潰的事還不到十年。劉將孫成此詩的年代雖不能確定的找出，但必定是入元以後相當久才寫的。到了這個時候，各人的想法（包括以上所討論過的人在內）都與起初大相逕庭。除此之外，他將元朝比為漢也許只是囿於用典，但未嘗不可以解釋作是他個人態度的反映。這與以上所說張觀光以秦喻元的態度相去就不可以道里計了。

「大廈既已顛」及「六姓更逐鹿」二詩寫得較為晦澀。通過前者，他似乎是在慨嘆陳宜中無才而致相位，最後終於誤事。然後對文天祥的被殺，隨德祐帝至燕的士大夫之未得用，以及趙孟頫的被賞識加以評論。¹³⁸對於趙氏，他並不是完全不同情的。至於後者，他以南朝來影射南宋，重點在於指出雖然政治本身像奕棋一樣，不必過分認真，士風的日下卻應當令人慚愧。¹³⁹但很多人對此並不注意，只把注意力放在不事二姓的原則上，對褚淵¹⁴⁰一類的人加以嘲笑。在他看來，士風的重整應該比單單講求不事二姓的原則更重要。¹⁴¹把「張良本為韓，陳平亦事項」與「如何千年齒，獨笑彥回冷」放在一起，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到劉將孫無疑是要為在新朝中出仕的人找出理論上的根據。¹⁴²

¹³⁸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二十九，頁一下，《和鄧善之秋興二首》中也有「揚雄識字苦」之句，而戴表元和鄧文原、趙孟頫兩人都是朋友，所以拿揚雄來比趙孟頫，在當時可能是很普遍的。

¹³⁹ 「姪嘲子廬墓」指王濟看不起王湛的故事，見《世說新語》卷中之上，頁四十八上——五十一上，「才士不遜」是王恭批評孫綽的話，見同書卷下，頁二十一之下。詩中這兩個典故意義所在並不太明顯，但看起來是指一般士風的低落。

¹⁴⁰ 《南史》（開明本）卷二十六，頁七十五（《褚彥回傳》）：「世頹以名節譏之。於時百姓語曰：『寧為袁粲死，不作彥回生。』」除了為褚淵不平以外，劉將孫尚有詩批評孟嘉在《晉書》中不應與桓溫同傳（見《養吾齋集》卷一，頁十二下及卷六，頁五），也是同樣態度的表現。

¹⁴¹ 這兩首詩並非不能被看成純粹的「詠史詩」，但如果採取這樣的觀點，便立即會遭遇到困難：第一，無法解釋「見稱莽大夫」句中的「現」字。第二，「如何千年齒」一句把過去與現在（當時的）聯在一起了，很難說他沒有「諷今」的念頭。由於這樣的考慮，還是把它們當作「感遇詩」為愈。

¹⁴² 根據《養吾齋集》中的文字，劉氏本人確實曾想去實踐「言寡尤，行寡悔」的那一套。延祐開科以前，他賀程鉅夫除學士於先（見卷八，頁六上——七下），致書姚燧於後（同卷，頁一上——六上）。然而這些干謁的舉動都沒有結果。最後靠自己能力去參加進士舉（參看注一三七），仍然沒有成功。像他這樣的例子應當還有不少，只是不見於現存記載而已。

以上所討論的各詩作者背景與個人的思想都不盡一樣，但是有若干共同之處。首先，在南宋滅亡以後，他們的心情都是極端的矛盾。一方面是西山守節（加上民族思想）的觀念在阻止他們為新建立的征服王朝服務。另一方面，熟讀詩云子曰的教育為他們所作的事業準備主要是學（教）與仕，此外很少有別的選擇。仕不用說是非參政不可，連教也大部分是由政府所控制。在這種情形之下，不論是想施展個人的抱負，甚或僅為了餬口，都幾乎不可能完全不與政府發生關係。其次，他們顯然可以與若干元政府所派往南方的地方官有學術上的交往，進而引為同調，如此便起了雙方的反應：北方來的仕人，對於南方學者（如吳澄和方氏兄弟）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和尊敬；南方的知識分子接觸了這些人以後，漸漸感到「斯文」在北方並未完全淪喪，對於新朝也開始改觀。第三，時間過去得愈久，南方知識分子就會愈體驗到惟一能幫助和促使他們實現他們的理想（包括道統的維繫）的是通過元朝政府，此外別無他途。因此便要找藉口來沖淡嚴格的「不事二姓」的原則。¹⁴³虞集另外有一首詩，恰巧局部的體現了以上所說的這幾點：

我因國破家何在？君為唇亡齒亦寒。南渡豈殊唐社稷？中原不改漢衣冠。溫溫雨氣吞殘壁，泯泯江潮擊壞欄。萬里不歸天浩蕩，滄波隨意把漁竿。¹⁴⁴

這時虞集尚未致顯擢，¹⁴⁵所以還有想作嚴子陵的念頭。本詩起首雖是他堂兄的殘句，他只是「足成」，但必定也代表了他自己當時的心情，然而已較寫輓文天祥詩時更為和緩。不用說，他仍是不忘故宋，眼前的賸水殘山更是提醒和加強了這種情緒。再就是對於元廷的寬大表示感激。對於我們而言，詩中最有興趣的卻是整個頷聯。他藉此對於華夏文化表示了信心：南宋固然保持了這個傳統，北方的政權卻也未將其破壞無遺。非常可能，就是因為南方的知識分子逐漸都有了「中原不改漢衣冠」的觀念，加上延祐以後科舉的復興，以及諸帝對於漢文化的重視，遺民的思想終於不再見之於筆墨。這種趨勢再經過了進一步的演變，使得知識份子由反元而變為擁元，最後甚至促成了包括鄭玉、余

¹⁴³ 此外還有一個正統觀念問題，可能對於南士態度的改變也很有關係。朱熹到晚年主張統一天下者得正統。他說：「問：『正統之說，自三代以下如漢唐亦未純乎？正統乃變中之正者，如秦、西晉、隋，則統而不正者，如蜀、東晉，則正而不統者。』曰：『何必恁地論！只天下為一，諸侯朝覲，獄訟皆歸，便是得正統。……如秦初猶未得正統，及始皇并天下，方始得正統。晉初亦未得正統，自泰康以後方始得正統。隋初亦未得正統，自滅陳後方得正統。如本朝至太宗并了中原，方是得正統。又有無統時。如三國、南北五代、皆天下分裂，不能相君臣，皆不得正統。』（見正中書局影印本《朱子語類》卷一〇五，頁九上）我們且不管照這個定義南宋是否得正統，但元既統一天下，「諸侯朝覲，獄訟皆歸」，應是得正統的。這也可以被用作南人仕元的理論根據。

¹⁴⁴ 《道園遺稿》卷三，頁三上——四下。此詩有序如下：「從兄德觀父與集同出榮州府君，宋亡，隱居不仕而歿。集來吳門省墓，從外親臨叩碑氏得兄遺蹟，有云：『我因國破家何在？君為唇亡齒亦寒，』不知為誰作也。撫誦不覺流涕，因足成一章，並發其幽潛之意云。」

¹⁴⁵ 參看《圭齋文集》卷九，頁三十下。

闕等的大批知識份子為元朝殉難的現象。¹⁴⁶如果僅以狹隘的「胡漢之別，華夷之辨」的思想來責備這些人，恐怕不一定是持平之論。其實他們的遭遇是應當同情的。翻開中國歷史來看，那一個朝代的知識份子能不仰當政者的鼻息？南宋亡後，讀書人如不屈身事元難道還有別的抉擇？近代往往有人認為曾國藩擁護滿清抑制太平天國是「維護名教」而加以稱許，對於元末明初一些士人的反對流寇和嚮往勝國則不能諒解。事實上，二者之間僅有程度上的差別，並不能說當時士人的反對韓山童、劉福通輩¹⁴⁷就是違背了儒家的原則。這是中國知識份子一貫的悲哀，又豈止限於有元一代而已！

校後記

我在此文草成以後，注意到《道園學古錄》（卷六）和《揭文安公全集》（卷三、卷十三）中都提及「全平章」赴江西行省的事。揭傒斯並說他在至順二年「平章江西行省事」。這是指阿魯渾長子岳柱而言。因此，一四四頁中所引吳澄致全平章的信自然是寫給岳柱的。這時吳澄已是八十老翁，自謂「耄耋之年」也就不是「過甚其辭」了。

¹⁴⁶ 參看趙翼《廿二史劄記》（中華書局本）卷三十，頁六四五——六四六，《元末殉難者多進士》條。又蒙思明《元代社會階級制度》（香港龍門書店影印本，1967年，頁二〇七——二一六）對元末叛亂的社會背景分析頗詳，亦可參看。

¹⁴⁷ 這班人（甚至包括早期的朱元璋在內）的意識形態在當時的確是反傳統的異端。關於此點，參看吳晗《明教與大明帝國》（原載《清華學報》十三卷一期，頁四十九——八十五，收入一九五六年出版的《讀史劄記》，頁二三五——二七〇。）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Southern Literati in Early Yüan:
Some Aspects as Reflected in Poetry**

(A Summary)

Yan-shuan Lao

Through poetry,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xamine the sentiment of southern Chinese literati towards the newly established conquest dynasty. For them, it was extremely difficult in the beginning to resolve the dilemma of having to maintain personal loyalty to the defunct Sung and to acquire a meaningful career under the Yüan. But as time passed, they gradually resigned to the political reality, and some even started to find justifications for serving the alien regime. It is interesting to observe the evolution of their poetry from being seditious to being submissive — especially in the case of Wu Ch'eng 吳澄 (1249-1333). In addition, the present article tries to contrast the literati's views on Ch'eng Chü-fu 程鉅夫 (1249-1318), the southerner turned court official, with their views on their northern colleagues.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